

# 父辈不在了,我们依然前行

——纪念思沁·毕力格图先生

□兴 安(蒙古族)

今年8月29日上午,苏茹娅在微信圈发出了一条微信:“爱永远。”同时发了四张照片,是她的父亲,著名画家思沁·毕力格图先生的四幅作品。我的心头一紧。早听说思沁先生中风了,行动不大便利,但去年见到苏茹娅时她还告诉我,说父亲的精神状态挺好。正在我有些不知所措的时候,她又在微信下面打出两行文字:“已成为天上最明亮的星,伴随着我,爱永远!”“老父亲思沁今天早上8点离开了。”思沁先生真的走了,我的心一整天都在空落当中。

少年时曾见过他几面,因为他是父亲一生的挚友。印象中的他的脸色总是红润的,是典型的蒙古人的脸型,眼眶细长,有点像历史课本上的成吉思汗的画像。也许是我当时正在学习绘画,所以我一直把他当作心中的老师、学习的楷模、让我尊敬的前辈。

家里有一本他的画册,里面记录了他一生的艺术成就:《蒙古秘史》人物组画、《成吉思汗》大型壁画,原作长达80米、高3米,刻画了近百个神态各异的人物形象。还有蒙古历史人物系列雕塑,很多表现蒙古族现实生活的作品等。叶浅予先生曾经在1991年“新时期美术创作全国理论会”上,赞扬他的绘画路子走对了,并评价他的《蒙古秘史》人物画:“这是他的创造,这是民族的觉醒”。邵大箴先生评价他创作的《蒙古秘史》系列历史绘画是一个创举。在思沁先生几十年的创作生涯中,他创作的《摔跤手赞歌》《剪羊毛》《挤奶少女》等14幅作品入选了全国美展,7幅作品被国家级美术馆收藏。他的艺术实践和成果也是多方面的,壁画、雕塑,还有水彩,他尤其擅长中国水墨,无论是工笔,还是写意,都能得心应手,别出新意。他的蒙古历史人物白描系列作品,给我印象很深,他在线体的构造上,突破了中国传统线描的形态,多采用顿笔的手法勾勒衣饰和铠甲,使人物的塑造产生一种粗犷的审美效果和沧桑的历史感。

父亲一直珍藏着思沁先生画的一幅奔马,线条简洁而有动感,尤其那如烈焰般飘飞的鬃发,淡与浓的融合与对比,给人一种宗教般的虔诚与狂热。画上用独特的成吉思汗时期的蒙古文字写着:“呼列呼列,衷心祝福,我们民族的著名作家特·赛音巴雅尔选集出版,赠送这匹马,以表祝贺。”这幅作品现在就挂在母亲家里显耀的位置上,成了两位蒙古族文学家和艺术家兄弟般的情谊的见证。

那天,去母亲家的路上,我一直犹豫该不该把思沁先

生去世的消息告诉她。父亲两年前离开了我们,母亲非常悲痛,为了怀念和纪念父亲,她亲自组织我们两兄弟,花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编辑出版了父亲的纪念文集《生命的光芒》。书一出版,她就特别嘱咐我一定要给思沁先生送书。

思考再三,我还是将思沁先生去世的消息告诉了母亲,因为我感觉,自从父亲生病,直到过世前后,一直躲在父亲背后充当贤内助的母亲突然变得强大了。她的话也比原来多了,且思维清晰,记忆力惊人。当我把消息告诉她时,只见她异常冷静,她转头看着墙上挂着的那张思沁先生送给父亲的画,用蒙古文念着上面的赠言。母亲坐的位置与画大概有四五米的距离,我相信她是看不清上面的字的,但是母亲竟然一字不落地背诵下来,并让我用汉语翻译其中的内容。

听母亲回忆,思沁先生出生在内蒙古兴安盟的扎赉特旗,属勃尔只斤氏黄金家族,是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的后人。他与父亲是乌兰浩特二中的同学,后来一起考上了内蒙古师范大学,他在美术系,父亲在蒙古语言文学系。两个人志同道合,惺惺相惜,经常在学校一起组织和参加一些文学艺术方面的活动。毕业后,父亲留校工作,后调回家乡乌兰浩特二中教书。他一直坚持写作,21岁就出版了一本蒙古文的诗集《春天》。而思沁先生则留在呼和浩特,专事画画,1989年被推选为内蒙古美术家协会的主席。后来父亲到北京工作,几十年里一直保持着与思沁先生的密切联络,彼此相互鼓励,在各自的领域获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2009年7月,两人同时荣获“内蒙古文学艺术杰出贡献奖”,被授予了金质奖章。这也是他们人生最辉煌的时刻。

思沁先生比父亲大一岁,终年82岁。父亲于2016年11月,先他两年多离世。这些天,我一直想,两位老同学老哥俩应该在天堂相聚了,他们或许还会像年轻时一样,意气风发,挥斥方遒,努力着他们未竟的事业,延续着他们美好的友谊。而作为晚辈的我们应该做的就是继承他们的遗志,做好自己的事情。不久前,我见到了作家敖德斯尔的女儿、作家萨仁托娅。她父亲也是我父亲非常好的兄长和朋友。那天我们同在内蒙古电视台首届文学品读会录制现场朗读各自的作品。她朗读的是她的长篇小说《远去的战马》片段。她在父亲过世后,用小说追忆着父亲那一代人在战争年代的不凡经历,并用文学继续着父亲未能完成的工作。那天,她朗读得非常感人,接触当中我感觉她是个非常



成吉思汗 思沁·毕力格图 作

善良、让我尊敬的大姐,同时让我们之间由于父辈的友情而产生一种天然的亲近感,就像是多年的老朋友。是啊,父辈之间的友谊似乎是天经地义地可以传递到后代的身上,让人感到温暖和力量。虽然父辈们在世的时候,我们没有能够相见相识,但是心灵是相通的。苏茹娅也是这样,她继承了父亲的绘画基因和才能,并且已经有了与她父亲相媲美的专业成绩。我还记得父亲很多年前就对我说过,他有一次看见她站在内蒙古饭店大堂高高的墙下,细心地画着一幅比她身体还要高得多的壁画。父亲的语气和神态里充满了对晚辈的赞赏,而我却把它当成了对我的激励,去年,我的水墨艺术个展在中国现代文学馆闭幕,她专程赶来参加并做了发言,让我有一份惊喜和感动。或许历史就是这样延续和轮回着,一代接一代地传承着前辈们的初心和使命。父辈不在了,我们依然前行,因为他们在向我们微笑——那是一种鼓励的也是安慰的微笑。

一直弄不清楚,这种树究竟是桦树还是什么树。反正我们鲍坪叫狗骨头树,也叫香拐子树,老师安排我们课外劳动的时候说是桦树。那时候秋季的课外活动或者说家庭作业,布置得最多的任务就是“唰”桦树叶。唰是个动词,顺着狗骨头树生长的路径,从尾到头使劲一“唰”,树叶就渐次脱离,被攥在手心了。当然,这个动作必须得重复好几次,才有满满一把树叶,然后放进身边的口袋里。这口袋一般都是用过的尿素袋,甚至是麻袋。

供销社收购晒干的狗骨头树叶,8分钱一斤。树叶不轧秤,一尿素口袋轻者十斤八斤,重者也不过十斤二十斤。要唰到一口袋,起码得两个下午。麻袋一般就更少了一小小年纪的我们还没这个本事——拖不动更背不起。

这个家庭作业有个很官方的名字,叫勤工俭学。通过自己的劳动,适当增加一点购买学习用具的费用,比如铅笔、练习本和橡皮擦之类的小开支。实际上,那时候每星期上课的时间并不多,扫地、大扫除、捡柴、支农等等,占据了相当部分时间。而唰狗骨头树叶主要集中在秋季的11月份前后,太早树上的叶子还没变黄,这就意味着树叶依然在树枝上。太晚则意味着树叶的水分被脱干,甚至轻轻摇晃树干,树叶便纷纷飘零。狗骨头树叶子全身黄中带红,站在山脚下很容易辨认。在绿色植物枫树杉树的掩映下,狗骨头树叶会发出耀眼的光,尤其在秋风的鼓动下,一片片白光不停地晃动,更为惹眼。

唰狗骨头树叶只能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不可越界。鲍坪人的山林几乎都在自家房屋前后,每家每户都养着看门狗,守护着房屋的前前后后。稍有点风吹草动,它们就开始狂吠。人家密集的,往往是一只狗发现警情,整个屋场的狗们立即响应。阵仗之大,一般人不敢下手。当然,最主要原因在于,学校要根据树叶斤两的多寡来评定“劳动积极分子”。学习再好,劳动成绩不能拉后腿。“德智体美劳”一旦瘸腿,三好学生的评选就有点悬了。

狗骨头树一般长不大,多数被砍伐烧火粪的时候顺手就给灭了。在粮食要命的年岁里,没有哪种植物可以免受砍伐之灾。鲍坪人有自己的判断进行取舍。该砍的一点也不含糊,该留的倒是还得合计合计。就如狗骨头树来说,

难以成材,或者说短期内难以成材,那就得牺牲。即便树叶多少有点产出,与粮食一比较,孰轻孰重一目了然。那些幸免于难的狗骨头树,多数时候皆是因为他身边实在没有更易成材的树木来调节山林的疏密度。于是,要找到这棵树也就加倍容易。

狗骨头树叶要晒干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唰回家的树叶,在院坝里晒上两三天,便可以装起来上交学校。最开心的事情,莫过于拿到了学校颁发的奖状。那时靠学习成绩得到老师的表扬,从未有过。在劳动上弥补一下,也算是感到有意义的乐趣。况且那时候,拿到劳动奖状是很光荣的事情。

如果将狗骨头树的上半场和下半场,划分为春秋两个季节,孩提时代天性爱玩的我们,当然喜欢春季了。狗骨头树上结有一种黄豆大小的颗粒,有点类似山胡椒,我们常将这些东西摘下来打枪。枪是水竹筒做的。将两边的竹节用砍刀或者锯子弄断做成枪管,再用一根细细的能穿过竹筒的小木棍,尾部辅以手柄,一支竹筒枪就这样诞生了,子弹正是这些树上结出的颗粒。先将一颗推进枪膛,直至枪眼部位,再喂上一颗,通过向前快速推移枪杆,使得枪膛内的空气在短时间内压缩、膨胀,直至将前面的颗粒喷射出去。而后面的颗粒顺位成为下一发子弹的积蓄,循环往复。

那时的男同学,几乎人手都有这样的标配,且每人的荷包里随时都能搜出不少“子弹”。课余时间一到,特别是放学后追着相互射击,就成了我们主要的娱乐方式。大家都以准确射击到对方的面部,导致其疼痛无比为快事。玩多了,便觉得男同学之间的射击不过瘾,便尝试往女生身上射,也因此捅了马蜂窝被老师罚站受到揪耳朵之类的惩罚。没收竹筒枪不管事,竹子大把,自己再做,只不过更为隐蔽而已。当然,也有被枪击中而受轻伤的,只要不伤及到眼睛,家长也不至于闹到学校。见到始作俑者,说几句,或者吓几句,便完事。

还有更聪明的学生,找到更长的竹筒,发明了连环枪。依次往枪膛里推送好几颗狗骨头子弹,最后猛力一推,啵啵啵,几颗子弹连续出击,那就更为过瘾。当然,最聪明的莫过于发明扳机的那种枪,扳机一扣,叭的一声,那感觉真叫

酷。这种枪一出现,不少人就跟着模仿。一时间,形成一个高潮。放学路上就有了“敌我”之战争。跑到队伍最前面的“八路军”先行埋伏起来,只等“敌人”进入埋伏圈,便噼里啪啦一阵猛扫,伴随着“冲啊”“杀啊”的声音,假戏转换为真正的战争是常有的事情。那时候,再多的枪也不管事了。

不知道谁首先叫这种树为狗骨头树的,只觉得这名字蛮有意思。鲍坪那一带,冬天蛮冷。很多学生,甚至大人,脚后跟患有冻疮。轻者奇痒无比,重者裂口流血甚至化脓。常见的办法就是将狗骨头,特别是狗腿的骨头用火慢慢炕干,擂成粉末状,敷到冻疮患处。狗骨头,特别是脚骨头,异常坚硬有力,用来形容这种老师称之为桦树的树,也是形象逼真。狗骨头树不像其它的树,树干和枝丫毫无生长规则,生性又坚硬无比,也更像狗命,一无所求,随遇而安,还极不容易丢弃。

我曾见过父亲当年杀狗的一幕,也是惟一的一次杀狗。

那年夏天,我们家喂养的年猪因病夭折,中途买回的接草猪还在长架子。眼看着就要过年了,家里一点油荤都没有。思来想去的父亲,最后决定拿那只老黑狗开刀。那是一只跟着我们十几年无比忠诚的狗,实在是找不到更好的办法了。父亲温柔地呼唤着它,迅速拿出准备好的绳子,一下将它的颈部套住,它还没反应过来,就被拉上晾衣服的木杆上给吊了起来。老黑狗无所谓地挣扎着,喉咙里发出含混的声音。我相信那个时候父亲的内心也是挣扎的。

直到后来我才知道,这狗骨头树,不仅树干坚硬犹如狗骨头,就连树叶也以另外一种形式向世人呈现出它极强的粘合性。那是水泥还极为稀缺的年代,鲍坪人将狗骨头树叶采摘回来,放进石碓窝里反复捶打,直至成为黏性极强的粘合剂,和着石灰、青灰、泥土等,广泛用于建筑上,相当于现在的水泥砂浆。据说这种建筑非常牢固,抵御似水流年的摧残和消解,是彼时最好的方法。只不过在以吊脚楼和土墙居多的鲍坪,少有用武之地。

狗骨头树的一生,几乎难以见得到成材的时候,一般都会在不经意间成为鲍坪人镰刀和斧头下的牺牲品,如同当年常常不得善终的狗,往往为了人类牺牲自己。

朋友,当你走进鄂尔多斯,你会被很多普通蒙古人的故事所震撼。

我认识一位普通的牧人,名字叫巴图,祖祖辈辈放牧在鄂托克旗的西边,他给我讲了一个找马的故事。那年,放牧一生的巴图,终于到了可以休息的年龄,决定收起马鞍子了。可就在那天夜里,他做了一个梦,梦见了可汗。可汗问他,我那八匹白色的骏马呢?老人一下惊醒了。从第二天早上,他就开始了寻找,寻找成吉思汗的八匹骏马,足迹遍及内蒙古全境。

从呼伦贝尔开始,老人一站一站地走着,一个马群一个马群地询问着。按照蒙古的习俗,马倌见到了马倌,都很亲热,尤其得知是为了寻找圣主的八匹骏马,大家都尽心地帮助,提供着线索。二十年前的草原,手机还没有普及,但马倌们有自己的联络方式,那就是奔腾的马蹄。功夫不负有心人,一年过去了,巴图找到了七匹白色的骏马,每匹都和传说中的一样,黑口、黑眼、黑色的圆蹄,蹄后是一缕黄白色的毛。毛色不是雪白,而是泛着青白色,那种被称为“温都根查干”的颜色。从兴安岭到巴尔虎草原,又到了锡林郭勒,穿过乌兰察布,走遍了巴彦淖尔,踏进了苍天般辽阔的阿拉善,再也找不到最后的那匹白色骏马了。老人似乎有点绝望了。当他路过额日布盖苏木的时候,他见到了当年成吉思汗去世前的坠马之地——阿儿不该营地,七百多年过去了,那尊高耸入云的祭天石柱依然矗立在原处。巴图翻身下马,祈告着圣主,诉说着找马的艰辛,希望得到指引。一位放骆驼的牧人对他讲,可汗年代的疆域是全世界,你去甘肃、陕北找吧,或许正在那边吃草呢!一句话点醒了巴图,他跨上了马,向南边走去。

路很远,巴图一路走下去。在一个路边的小饭馆,巴图询问着村民。老板仔细地看着白马的图片,大声吆喝来一个后生,大家异口同声地说,他们鹰嘴崖村就有一匹这样的马。巴图把坐骑留给了店家,随着后生进山了……

这是一个山峰上的村落,鹰嘴崖很高,也很陡,鹰嘴一样的山洞拐过去,才能进村。听说有人买马,村民们都聚拢过来,把他引到一处马厩前。白马见有人来,很紧张,耳朵向后背去,发出阵阵嘶鸣。巴图仔细一看,正是自己朝思暮想的蒙古马。他走近白马,用蒙古语和它交流着,交流着,白马的神态渐渐平静下来。巴图退后,深深地跪下,向白马致意。村民们惊呆了,这世界上竟然还有人给马下跪……巴图起身走近它,轻轻地唱起了蒙古民歌《成吉思汗的两匹骏马》,长调飘了起来,飘过山岭,像是来自母亲草原的问候。“成吉思汗的两匹骏马啊,那匹小马它还在吗?阿尔泰杭盖多么雄伟,骏马本是天马驹哟……”白马发出一声长长的嘶鸣,巴图看见几滴大大的泪水从白马眼睛里滚落下来,他一把将马头搂进自己怀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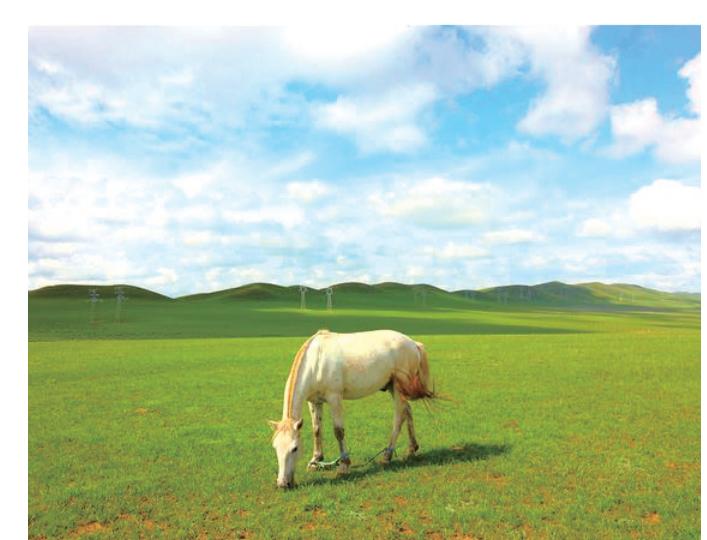
马的主人是个青年,后悔买了这匹蒙古马,它既不会耕田,也不会犁地,只爱奔跑,主人恨不得马上将这马卖掉。但村民们不这样看,他们阻止着,喊着高价。巴图陷入了两难的境地。这时,来了一位长者,问巴图到底能出多少钱。巴图告诉大家,我只有两万块钱。村民们悄悄商议了一下,同意卖马,但要他签下生死合同,因为鹰嘴崖太险,白马过不去,只能用木杆将白马捆好,像担架一样抬过去,稍有闪失,人和马都可能跌下悬崖。生死合同签了,巴图按上了红红的手印。

马很听话,倒在地上,村民们将它捆牢,一步一步抬向鹰嘴崖,后来,竟是一尺一尺地穿过崖口,在最难走的拐弯处,几乎是一寸一寸地挪过去……马的半个身体悬在空中。它很乖,全无挣扎,松明火把噼剥地燃着,全体村民大气不敢出一声。终于,挨过了崖口,大家轻轻地松开绳索,白马站了起来,一抖身,马屁股将一个村民撞了一下,村民一下滑倒,滑向峭壁,巴图一把抓住他的衣领,摔倒在栈道上,大家扑上去,所有的人都瘫倒在地上。

终于来到山脚,饭馆老板已经将巴图的马牵了过来,告别的时刻到了。村民们沉默不语,感觉有点悲惶神伤,马主人的婆娘悄悄地啜泣着。巴图将捆好的两万元掏出来,递给了马主人。马主人掏出生死合同,嚓嚓撕碎,扔掉,抽出一万元,收好,另一万元退还原给巴图。巴图怔在那里。马主人说,我们看出来了,它想家哩,我们陕北人厚道,不敢多要蒙古人的钱哩!

巴图跨上马上路了。白马轻盈地跟在后面,很快乐。天,下起了雨,两匹骏马相跟着向草原的方向走去。突然,身后响起了一声《信天游》的吼声:“一对对白鸟哟天边跑,一串串泪蛋蛋往下跌……”白马忽然长嘶一声,转身向主人跑去,像是回应,又像是告别;它在山脚前打了个转,又翻身跟上了巴图,头也不回地向前疾驰。巴图没敢回头,不知是雨水还是泪水,模糊住了双眼……

故事讲完了,我和巴图站在他的草场上,八匹白色的骏马在他身边跑来跑去,还有几匹一模一样的小马驹咴咴叫着,寻找着母亲。我问巴图:“为什么是你呢?”巴图看着自己的白马群,缓缓地说:“我是个马倌啊!万一可汗真的有灵魂,回到鄂尔多斯,见不到他的八匹骏马怎么办?我们该说什么呢?”



## 成吉思汗的八匹骏马

□克明(蒙古族)

